

边缘思想

《天涯》随笔精品



http://www.hk.hicn
Frontiers

天
涯

南海出版公司

边缘思想

《天涯》
随笔精品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边缘思想:《天涯》随笔精品/贺雄飞主编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9.10
(草原部落名报名刊精品书系)
ISBN 7-5442-1447-8

I. 边… II. 贺…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0581 号

BIANYUAN SI XIANG

边缘思想

——《天涯》随笔精品

总体策划 草原部落

责任编辑 刘孝阳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

印 刷 河北省固安新知识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5.875

字 数 395 千

版 次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书 号 ISBN 7-5442-1447-8/I·275

定 价 25.00 元

南海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主编荐语

本丛书推出的第一批名刊为《博览群书》、《上海文学》、《北京文学》、《文艺争鸣》、《天涯》、《黄河》、《百年潮》等八本优秀人文社科期刊。这些刊物在纷扰的世纪末，卓尔不群，各具风格。拥有稳定的读书群，深受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喜爱。阅读它们，等于站在了世纪之交中国思想文化界和文学界的前沿。书中所收文章均为编者精心筛选的佳作，内容隽永经典，作者不是大家就是新锐，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

《博览群书》，最权威的老牌书评杂志；

《天涯》，最前卫的大文化双月刊；

《上海文学》，最可读的贵族化文学期刊；

《黄河》，最平民化的大型知识分子期刊；

《文艺争鸣》，最有个性的文学评论期刊；

《北京文学》，最有良知的大型文化期刊；

《百年潮》，最受读者欢迎的党史政史月刊。

ABB36/08



“草原部落”名报名刊精品书系

风雨敲书窗《博览群书》百期精选

边缘思想《天涯》随笔精品

边缘感觉《天涯》小说精品

边缘纪录《天涯》民间语文精品

守望灵魂《上海文学》90年代随笔精品

重返五十年代《黄河》忆旧文选

世纪论语《文艺争鸣》作品精选

今日思潮《北京文学》作品精选

历史的真相世纪末《百年潮》回首

装帧设计：深圳市韩家英设计有限公司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第一辑

- 3 韩少功 完美的假定
- 18 张 炜 绿色遥思
- 25 吴 亮 生活在模仿表演
- 42 朱学勤 平静的坏心情
- 57 周国平 私人写作
- 65 徐 晓 无题往事
- 86 蒋子丹 岁月之约
- 99 张志扬 瑞典交谈：个人
- 108 张汝伦 乡愁
- 114 史铁生 说死说活
- 121 余世存 国耻
- 130 于 坚 南方与新世界
- 139 摩 罗 巨人何以成为巨人
- 146 李 锐 精神撒娇者的病例分析
- 160 西 川 难以描述的旅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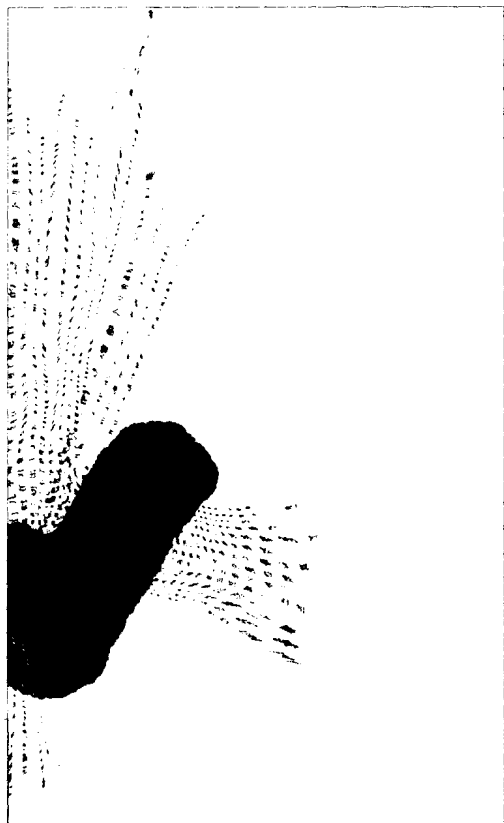
第二辑

- 173 陈思和 就 95“人文精神”论争致日本学者
- 186 张 宽 文化新殖民的可能
- 201 李 陀 差异性问题的笔记
- 210 余 华 谁是我们共同的母亲?
- 218 陈嘉映 感人·关切·艺术
- 233 李泽厚 新儒学的隔世回响
- 243 乌热尔图 弱势群体的写作
- 252 秦 晖 社会公正与学术良心
- 261 汪 晖 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
- 298 王晓明 罗 岗 人文教育与人文精神
- 315 何清涟 什么样的“发展”?
- 324 何家栋 在历史的转折点上
- 334 易 英 金钱的诱惑与批评的失落
- 342 韩毓海 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
- 355 钱理群 回顾八十年代
- 365 南 帆 电子时代的文学命运
- 389 徐友渔 “后主义”与启蒙

第三辑

- 401 李 皖 摇滚乐的失语症

406	刘索拉	新的“救世主”让人没脾气
410	邵燕祥	只因他的思想变成铅字
415	戴锦华	生为女人
419	北 村	信仰问答
422	严 锋	真实的虚幻与虚幻的真实
428	单正平	开会
436	陆建德	洗眼
439	赵汀阳	存在就是做事
445	徐 冰	古元的意义
449	黄 平	教化的困惑
454	何志云	都市流行话题
461	单世联	指挥贝多芬的权利
468	葛兆光	阴晴不定的日子
476	余 杰	玩知丧志
480	李少君	公司与国家(外一篇)
486	孔 见	赤贫的精神
496	杨小彦	读图时代



第一辑

完美的假定

韩少功

—

回顾一下三十年代,也许会使现在很多人大为惊讶,那是史学家命名的“红色三十年代”,批判体制的文学,“劳工神圣”的口号,贫穷而热情的俄罗斯赤卫队员,不会提供一分钱利润,却居然成了人们的希望,居然引导了知识界以及一般上流开明人物的思想时尚,不管是用选票还是用武装暴动的方式,左派组织在全世界快速繁殖,日渐壮大,眼看着国家政权唾手可得。布莱希特、A·勃勒东、阿拉贡、加缪、德莱赛、瞿秋白、聂鲁达、罗曼·罗兰、芥川龙之介以及时间稍后一些的毕加索和萨特……一大批重要知识分子的履历中,无不具有参加共产党或者自称社会主义者的纪录。

六十年代,又发了一次全球性的左派烧。中国“文革”不用说,法国的“红五月”也惊天动地,小语录本在地球的那一边也被青年们挥动。勃涅日列夫在苏联上台向左转,太平洋彼岸的黑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也交相辉映,在白宫前炮打司令部。不仅是广获同情的越南和古巴,多数从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亚非拉弱小民族,竞相把“社会主义”和“国有化”当作救国的良方,不仅是格瓦拉、德钦丹东和阿拉法特,一切穷苦人和受难者的造反领袖,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差不多成了众多青年学子耀眼的时代明星,成了偶像和传说。

这些离我们并不遥远。

二

同样并不遥远的,是潮起潮落,每一次左向的转折之后,都似乎紧接着向右的反复和循环。左派的理想,左派在这个时代的诸多特定含义:国有化、计划经济、大公无私、阶级斗争、均贫富、打破国际垄断资本等等,从来没有得到历史的偏宠,在实践中并非能够无往不胜。

变化周期似乎总在十到二十年之间。

三十年代以后是五十年代,是匈牙利事变,南斯拉夫的半自由化转向,中国的夏季鸣放和庐山诤谏,苏共的二十大反“左”报告以及社会的全面“解冻”,欧美各个共产党的纷纷萎缩或溃散,加上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反共恐怖插曲。对于左翼阵营来说,一个云雾低迷和寒气暗生之秋已经来临。红色政权即便可以用武装平息内乱,用政治高压给经济运行的钟表再紧一把发条,但发条上得再紧,很多零件已经出现的锈蚀和裂痕却没法消除,故障噪声已经嘎嘎渐强。

六十年代的狂热一旦落幕,历史的重心再一次向右沉重地偏移。共产主义的行情走低,在八十年代一路破底。一夜之间,柏林墙推倒了,革命导师的塑像锯倒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纷纷易帜,贫穷而忿激的人们成群结队越过边界,投奔西方,寻找面包、暖气、摇滚乐、丰田汽车、言论自由、绿卡以及同情的目光,甚至在凯旋门下或自由女神像下热泪盈眶。在很多地方,“左”已经成了十恶不赦的贬词。众多知识分子对自己在三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经历深表忏悔和羞愧,至少也是闪烁其言,或者三缄其口。相反,重新认识和评价西方的管理体制和技术成就,重新认识和评价个人主义之类的价值观念,成为了全球性知识界的流行话题,成了现代人开

明形象的文化徽章。

“私有化”一化到底,已经“化”了的地方也还嫌化得不够彻底,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接连出台,向自家园子里的经济国有成份和社会福利政策下刀,竟没有太多的反对派胆敢多嘴。

一个西方记者说,眼下除了梵蒂冈教皇和朝鲜,再没有人批评资本主义了。这个话当然夸大不实。但从全球的范围来看,现在还有多少共产党人或社会党人在继续憎恶利润和资本呢?还有多少听众会从这些政党的背影汲取自己生存的信心呢?也许,这是一个传统左翼人士不愿正视的问题,却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处境。

事情已经大变。对变化的过程,当然还需要由历史学家作出更周详更精确更清晰的描述。一个基本的现象,却不难在我们粗略的回顾中浮现,不难成为我们的视角之一:经过一个短短的周期,历史似乎又回到了原点——六十年代再版了三十年代,八十年代则是以西方一片眩目的现代化昌荣,使五十年代得到了追认和复活。

下一个十年,会怎么样?

再下一个十年或二十年,又会怎么样?

我听到未来正在一步步悄然而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物极必反,阴尽阳还;风水轮流转;七八年再来一次……中国人对历史演变规律的朴素把握,曾有过多神秘的揣测,两分模式也显得过于粗糙。我对此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历史是被什么样的一只手在操纵?我感兴趣的是,不管是“左”还是右,还是别的什么,一种思想,是如何由兴到亡?一种体制,是如何由盛及衰?它们是如何产生然后耗竭了自己的思想活力和体制优势?如何获取然后丧失了自我调整自我批判自我革新的机能?如何汇聚然后流散了自己的民意资源和道义光辉从而滑向了困局——乃至冷酷无情的大限?

想一想这些问题,似乎显得有些傻。

三

切,是南美洲穷苦人民对格瓦拉简短的昵称,也几乎成了相当时期内在他们之间秘密流传的神圣暗语。

这个神圣的暗语生于 1928 年,是西班牙人和爱尔兰人的后裔,年轻时就习惯于独身徒步长旅,结识和了解社会最底层的卑贱者。他所献身的革命游击战在古巴获胜之后,这位卡斯特罗的密友,这位全国土地革命委员会主席和国家银行行长,因为失望于胜利以后的现实,突然从所有公众场合销声匿迹。

10 月,卡斯特罗公布他留下来的一封信,信中只是说:“因为其它国家需要我微薄力量的帮助”,他决定去那些国家重新开始斗争。这位命中注定的“国际公民”,这位被哲学家萨特称为“我们时代完美的人”,后来在刚果和玻利维亚等地的故事,我是从一部录像带里看到的。录像带有些陈旧模糊,制作者显然是一个西方主流派的文化人。在他的镜头下,格瓦拉消瘦苍白,冷漠无情,偏执甚至有些神经质,是一个使观众感到压抑和不安的游击战狂人。即便如此,狂人在雨夜丛林中的饥饿,在群山峻岭中衣衫褴褛的跋涉,在战火中的身先士卒以及最后捐躯时的从容——还有孤独,仍然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里。

他流在陌生异乡的鲜血,无疑是照亮那个年代的理想主义闪电——尽管关于他的录像带,眼下是最滞销的之一,最没有人要看的之一。租带店的青年这样告诉我。

与格瓦拉同时代的吉拉斯,则是另一种类型的理想者。与前者不同的是,吉拉斯不是选择了更“左”的道路,而是从右的方向,开始了他新的生命——当时他同样官阶显赫位极人臣,1953 年出任南斯拉夫的副总统、国会议长,是铁托最为器重的同志和兄弟。

他的第一本书传入中国,是六十年代中期在部分红卫兵中偷偷翻印和传阅着的《新阶级》,与遇罗克的《出身论》同时不胫而走。在我读过的一本字迹模糊的油印小册子上,作者当时的译名叫“德热拉斯”。读到他的第二本书则是八十年代了。《不完美的社会》讨论了宗教、帝国主义、现代科技、所有权多样化、暴力革命、民主、中产阶级等等问题,给我的印象,作者对这个世界有现实感,拒绝相信和许诺任何“完美”的社会模式。他描绘了资本主义正在汲取社会主义(比方社会福利政策),而社会主义也必须汲取资本主义(比方市场经济)的前景。他的很多观点,无异于后来大规模改革的理论索引。

因为发表这些文章,加上因为公开在西方报刊撰文同情匈牙利事变等等,他不但被剥夺了一切职务,而且三度入狱,被指责为革命的罪人,比彭德怀的遭遇还要惨。他不是没有预料到这样的后果,不,他极为清醒地为自己选择了通向地狱之路。当他打算与同僚们分道的时候,他满心哀伤和留恋,也不无临难的恐惧。《不完美的社会》中很多论述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了,但有一段描写历历在目:在一个旧贵族留下的大别墅里,灯火辉煌,丰盛的晚宴如常进行,留声机里播送着假日和盛情。在一大群快乐的党政要人里,只有吉拉斯在灯光照不到的暗角里,像突然发作了热病。他看到革命前为贵族当侍者的老人,眼下仍然在为他 and 同僚们当侍者。他看到革命前为贵族拉货或站岗的青年,现在仍然在风雪中饥饿地哆嗦。唯一变化了的,是别墅主人的面孔。他突然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刺心的问题:胜利的意义在哪里?

就是在这个夜晚,他在家来回踱步整整一个夜晚。家人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也不愿用他的想法惊扰家人。但他决定了,决定了自己无可返程的启程。如果他一直犹豫着,该不该放弃自己的高位,该不该公示自己的批判,那么在天将拂晓的那一刻,全部勇敢和果决,注入了他平静的双眼。

欧洲一个极为普通的长夜。

这个长夜是一个无可争辩的证明：同情心，责任感，亲切的回忆，挑战自己的大义大勇，不独为左派专有。这个长夜使所有经过了那个年代的我们羞愧，使我们太多太多的日子空洞而苍白。

四

初读吉拉斯的时候，我还不大能接受他的奇异。再读吉拉斯的时候，又觉得他的理论深度和广度不够我解渴，某些看法也可存疑。但这并不妨碍我的感动。

我庆幸自己还有感动的能力，还能发现感动的亮点，并把它与重要或不重要的观念剥离。我经历大学的动荡，文场的纠纷，商海的操练，在诸多人事之后终于有了中年的成熟。其中最重要的心得就是：不再在乎观念，不再以观念取人。因此，我讨厌无聊的同道，敬仰优美的敌手，蔑视贫乏的正确，同情天真而热情的错误。我希望能够以此保护自己的敏感和宽容。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吉拉斯的理论是不太重要的，与格瓦拉的区别是不太重要的，与甘地、鲁迅、林肯、白求恩、屈原、谭嗣同、托尔斯泰、布鲁诺以及更多不知名的热血之躯的区别，同样是不太重要的。他们来自不同的历史处境，可以有不同乃至对立的政治立场，有不同乃至对立的宗教观、审美观、学术观、伦理观……一句话，有不同乃至对立的意识形态。但这些多样而且多变的意识形态后面，透出了他们彼此相通的情怀，透出了一种共同的温暖，悄悄潜入我们的心灵。他们的立场可以是激进主义也可以是保守主义，可以是权威主义也可以是民主主义，可以是暴力主义也可以是和平主义，可以是悲观主义也可以是乐观主义，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呈现出同一种血质，组成同一个族类，拥有同一个姓名：理想者。

历史一页页翻去，他们留下来了。各种学说和事件不断远退，

他们凝定成记忆。后人去理解他们,总是滤取他们的人格,不自觉地忽略了他们身上的意识形态残痕。他们似乎是各种不同的乐器,演奏了同一曲旋律;是不同轨迹和去向的天体,辉耀着同样的星光。

于是,他们的理想超越着具体的目的,而是一个过程;不再是名词,更像一个动词。

他们也是人,当然也有俗念和俗为,不可能没有意识形态的局限,难免利益集团的背景和现实功利的定位。挑剔他们的不足、失误乃至荒唐可笑,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事。在当今一些批评家那里,即便再强健再精美的意识形态,都经受着怀疑主义的高温高压,也面临着消解和崩溃的危险,何况其它。随便拈一句话,都可以揭破其中逻辑的脆弱,词语的遮蔽,任何命题的测不准性质,于是任何肖像都可以迅速地变成鬼脸或者漫画。问题在于,把一个个主义投入检疫和消毒的流水线,是重要而必要的;但任何主义都是人的主义,辨析主义坐标下人生状态,辨析思想赖以发育和生长的精神基质和智慧含量,常常是更重要的批判,也是更有现实性的批判,是理论返回生命和世界的入口。

意识形态不是人性的唯一剖面。格瓦拉可以过时,吉拉斯也可以被消解,但他们与仿格瓦拉和伪吉拉斯永远不是一回事。他们的存在,使以后所有的日子里,永远有了崇高和庸俗的区别。

这不是什么理论,不需要什么知识和智商,只是一种最简单最简单的常识,一个无需教授也无需副教授无需研究生也无需本科生就能理解的东西:

美的选择。

年轻的时候读过一篇课文,《Libido for Ugly(对丑的情欲)》,一个西方记者写的。文章指出实利主义的追求,使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爱上丑物丑态,不失为一篇幽默可心警意凌厉的妙文。很长时间内,我也在实利中挣扎和追逐,渐入美的忘却。平宁而富庶的